



梁啟超的思想

宋文明著

梁啟超的思想

宋文明著

梁啟超的思想

宋氏照遠出版社出版

梁啓超的思想

—宋文明選集之二—

出 版 者：宋氏照遠出版社

台北縣中和市景新街286巷10號2樓

電話：(02)9413242 傳真：(02)941345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321號

郵撥：0002161-1 宋文明

創 辦 人：宋文明

發行人：宋天姁

總 編 輯：李玉成

總經理：劉國繡

學 術 及：王志敏(西安)、朱邦復、朱養民(美國)、
社 務 顧 問 周衛(上海)、洪同、胡鴻文、唐風、馬之驢、崔垂言、陳宏正、陳隆昊、張鎮邦、彭誠晃、楊正民(巴西)、楊連德(蘭州)、趙少平、劉師誠、劉國瑞、蔡和男、蕭智賢(依筆劃)

駐日本代表：劉汶鏘

封 面 設 計：黃瑪琍

總 經 銷：唐山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樓

電話：(02)3633072 傳真：(02)3639735

印 刷 者：志承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179號

電話：(02)2497064

中華民國86(1997)年7月初版

定價200元 郵購2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梁啓超的思想／宋文明著，——初版
——臺北縣中和市：宋氏照遠，民86
面； 公分。
——（宋文明選集；2）
ISBN 957-99678-6-5（平裝）

1. 梁啓超—學術思想—哲學

128

86006417

新版自序

時值清末民初，中國便進入了最動亂最危險的關頭，尤以辛亥革命以後爲然。內則因強人袁世凱的突然消失，軍權分裂，整個國家立即陷入軍閥的割據與混戰。外則因歐戰的拖延，歐美列強受困戰場，自顧不暇，遂更激發了日本對中國的覬覦與獨霸野心。後來的巴黎和會，雖以當時美總統威爾遜的主持正義，而暫時打消了日本侵佔膠東半島的狂想，但它從未放棄以蠶食及鯨吞方式，征服全中國的根本企圖。

就在這種內外交迫的危機年代，中國南方則有一位走革命路線的孫中山，困守南海一隅，在無可奈何下，繼續進行抗爭；而在當時中國政治中心所在的北京，也有一位特出的高級知識份子，面對全中國的遍地混亂與失望，而獨不被利誘威脅，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高亢的精神，旺盛的鬥志，而和國內外惡勢力相抗衡。這位高級知識份子，便是本書所介紹的廣東新會梁啓超。

回顧二十世紀的整個中國歷史，我們發現有三位著名學人，一面畢生孜孜於學術的研究，著書立說，成就非凡；另一面又相當深入當時國內政治，出任要職，而對當時及後世留下非常美好的形象。這三位學人，便是梁啓超、胡適、與郭沫若。他們都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環境下，而扮演了相同的角色，發揮了相同的作用。其中尤以開創性的梁啓超，更成爲二十世紀中國新知識

份子的一種典型，橫跨學術與政治兩界，而獲有相當輝煌的成就。

由於梁啓超所處的環境，是一個積弱、專橫、落後，而又不得不實行變革的中國，所以他便在这种大時代的要求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一位堅強的愛國主義者、改革主義者、及進步主義者。作爲愛國主義者的梁啓超，不論在當時或後代，沒有人持何異議；但由於他的名字，一度曾和保皇派的康有爲連在一起，相提並論，所以就不免有人誤認爲，他所持者爲皇權改良主義，而非改革主義；是保守主義而非進步主義。其實梁啓超的作爲正統的改革主義者及進步主義者，不祇可見諸於他的政治言論及對當時實際政務的態度，也見諸於他的哲學思想。尤其從他一生的經歷，不惜以今日之我而與昨日之我作戰，更可看出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隨時代進步的改革主義者與進步主義者。對此，本書所談種種，應可提供足夠的證據。

本書版權，原於六十年代讓渡於台北水牛出版社，連出數版，坊間銷售良好。茲以本人籌出選集，而將本書包括在內時，便立蒙該社慨然允諾，准由本人無條件收回版權。於此，本人於自行出版，再度闡明本人撰寫本書基本旨趣的同時，亦願趁機對水牛出版社董事長彭誠晃先生對本人的珍貴友誼，及作爲大出版家的崇高風格，謹致誠摯的謝意。

自序

梁啓超爲我國近代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亦是一位偉大人物。不論研究中國近代史，近代政治和學術，都將離不開梁啓超這位人物。

從政治方面來講，梁啓超在中國近代史上，代表着一個改革與進步的傳統。這一傳統愈到後來，亦愈益顯出它的重要和時代意義。

再從學術方面來講，梁啓超更是一位致力於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的開創性人物，對中國文化的更新與吸收西學，曾發生了一種深遠的歷史影響。可以說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能從國學轉西學，再從西學轉國學，主張西化而不盲從，尊重傳統而不復古，鑽進鑽出，吸精去蕪，而能始終保持客觀與批判態度者，爲數并不很多。而梁啓超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少數幾個人之一。梁啓超對西

方學問所作的努力，若以今日標準來看，可說既不够廣闊，亦不够深刻，但他充分了解與體認西方文化的精神。在整理國學方面，梁啓超的成就，亦同樣不够博大精深，但我們絕不能否認他在這一方面曾下過一番非凡的功夫及其所獲得的獨特的創見。

至於梁啓超政治才華的高超，政治氣魄的出衆，政治節操的堅貞，政治人格的完美，及其文才的雄偉磅礴，文筆的銳利鋼勁，如千軍萬馬，長驅無阻，更爲世人所公知。

然則，梁啓超在本質上究竟是屬於何種典型的人？他的思想層次如何？他有無一種完整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對現代中國社會的意義又何在？這都是一些大家所要知道的問題，也爲研究梁啓超這個人時所不能避免的問題。本書所列這十篇文章，便屬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嘗試性解答。

這十篇文章雖包括了梁啓超思想的各主要方面，但由於作者學識謬陋，觀察不深，所談種種，恐不能真正表達梁啓超思想的全貌。因此，要想真正作到完全瞭解梁啓超這個人及其思想，還需要各方碩彥及後來學子，作更多更進一步的努力。不過，若以這本書的出版，能引起對這位中國近代史上偉大人物的研究興趣，繼續予以發揚，則這本小書也便有了它的歷史意義。

宋文明序於五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目次

新版自序	一
自序	三
一、梁啓超與傳記文學	一
二、梁啓超看儒家思想	一一
三、梁啓超的道德觀	二三
四、梁啓超的歷史哲學	三三
五、梁啓超的方法論	四七
六、梁啓超的進步主義	五九
七、梁啓超的「新民」理想	七一
八、梁啓超的經濟思想	八九
九、梁啓超看世界人類前途	一〇三
十、梁啓超論人性	一一五

附 錄 :

一、梁啓超論譚嗣同.....	一二九
二、梁啓超看左侍.....	一三五
三、梁啓超看論語.....	一四七
四、梁啓超看史記.....	一五九

梁啓超與傳記文學

一

在中國近代學人及思想家中，對於古今中外的名人傳記，讀得最多，寫得最多的，新會梁啓超氏（一八七三——一九二九），便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最多的一位。他一生所寫的中外名人傳記，在外國方面的，主要者有：匈牙利復國運動領袖噶蘇士，意大利復國運動三傑瑪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的，法國革命及民權運動領袖羅蘭夫人等。在中國方面的，主要者有：管子傳，王荊公傳，辛稼軒年譜，朱舜水年譜，陶淵明傳（附年譜），張騫與班超合傳，鄭和傳，袁崇煥傳，趙武靈王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中國之武士道，戊戌政變六君子傳，康南海傳，以及論李鴻章等；除此之外，在他所寫的孔子，戴東原，王陽明諸人學說簡介，以及其他各種著作中，

也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傳記文學資料。至於他一生所讀過的古今中外名人傳記究竟有多少，恐怕就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

世人都知道梁啓超是一位國學大師，一位啓蒙運動的領袖，對介紹西學貢獻很大，但都沒有特別注意他在傳記文學方面的特殊成就。這也許由於他一生多姿多采，聲名崇高，致使他這方面的成就掩而未彰。但若我們要瞭解梁啓超的一生及其全部成就，而不把他在傳記文學方面的成就作一正確的估量，那就根本無法真正認識梁啓超這個人了。

二

可是梁啓超之於傳記文學，不論所寫者爲外人，爲國人，爲今人或古人，都和一般的傳記文學家有所不同。一般的傳記文學家，是爲傳記文學而傳記文學，是爲其人而人，而梁啓超所介紹的，除李鴻章評傳爲一特殊的例外，其他則都屬他所崇拜的英雄與偉大人物。這種英雄與偉大人物，出身背景雖各有不同，一生成敗利鈍相差懸殊，甚至在一般眼光中，其中有些人物則屬無足輕重，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莫不犧牲或貢獻出自身的一切，以愛國救國愛人救世，爲其職責。換言之，梁啓超所介紹的人物，並不是屬於一般性有成就的人物，而是爲愛國救國，愛人救世提供特殊貢獻而有特殊作爲的志士與烈士人物。由於梁啓超在生之年，中國正值內憂外患

紛至沓來，國將不國，所以他所寤寐以求者，也便是希望全中國有無數的志士出，烈士出，以負起振衰起蔽，復興國家的責任。現在就看他對其中一些主要人物的認識及觀感：

(一)當他談到十九世紀匈牙利復國英雄噶蘇士（一八〇二——一八九四），曾竭盡畢生之力，屢經失敗艱險，而終未目睹其祖國完全獨立時，便說：「吾儕專制之民也，故吾法專制國的豪傑，切於自由國的豪傑；吾儕憂患之士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傑，甚於得意之豪傑。」（註一）最後他說：「今天下之國，其窮蹙如前此之匈牙利者何限？而噶蘇士何曠世而一不遇也？海山蒼蒼，海水茫茫，其人若存，吾願爲之執鞭而忻慕者也。」其崇拜仰慕之情，真是溢於言表。（註二）

(二)當談到法國大革命時的羅蘭夫人時，他說：「以如此之家，而能生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造英雄，而非種性之所能爲力也。」（註三）又說：「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爲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爲夫人之咎也。」（註四）

(三)當他談到張騫與班超時，便說：「……如此大義，審此時勢，則張博望、班定遠之人物，與其在數千年歷史上之價值可以識矣。」（註五）又說：「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

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二傑之所長（指英征印兩英雄）。……斯真千古之快男兒，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即班侯是已。」（註六）。接着又說：「班定遠之人格，可以爲國民模範者，不徒其在活潑進取也，而尤其在堅忍沉毅。……故黃族之威，震於域外者，以漢爲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二傑者，實我民族帝國主義絕好模範之人格也。」（註七）

（四）當他談到明末鎮邊督帥袁崇煥的一生時，便說：「若於吾先民中求完備之軍人資格者，袁督帥當之矣。……天下古今冤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殊未有袁督帥若者也。」（註八）

（五）在他談到管仲與王安石時，便說：「前此之讀書論世者，或持偏至之論，挾主奴之見，引繩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業，泯沒於謬悠之口者，不可勝數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蓋偏徵西史，欲求其匹儔而不可得，而商君荆公，爲世詬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毀譽參半，卽譽之者，亦非能傳其真也。余旣爲荆公作洗冤錄，商君亦得順德麥氏爲之訟直，則管子傳不可以無述。」（註九）

（六）在他談到意大利建國三傑時，便說：「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嘆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註十）

(七)在談到陶淵明時，便說：「他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是一位極嚴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他本來意氣飛揚不可一時，中年以後，漸漸看得這惡社會沒有他施展的餘地。」

(註十一)

(八)在談到朱舜水時，便說：「明亡後，他屢屢欲作光復的事業。……經過多少艱難困苦，到底毫無成就，後來鄭成功張蒼水大舉北伐，他在蒼水軍中，規畫一切，結果還是失敗了。自是之後，他便打定主意，在滿清統治之下，絕對不回中國。」(註十二)

(九)在談到中國之武士道時，便說：「以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極於今日，皆此之由。故曰時勢造之，地勢造之，而又不得不終致憾於人事也。……吾故今蒐集我祖宗經歷之事實，貽最名譽之模範於我子孫者，敘述始末，而加以論評，取日本輸入通行之名詞，名之曰中國之武士道，以補精神教育之一缺點云爾。嗚呼我同胞，興！興！興！」(註十三)又說：「吾述中國之武士道，起孔子而訖郭解，陰氣森森而來襲余心，吾投筆歎歎，而涕交頤。」(註十四)

(十)在談到趙武靈王時說：「論者或以爲國民之性質，由於地理上遺傳上所限定，謂吾國民之文弱，其天性也。嘻，何爲其然。觀於武靈王時代之趙國，雖泰西之斯巴達，何以尚之。夫非猶是五輩之祖宗也歟？」(註十五)

(十一)在談到中國殖民八大偉人時，他說：「國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國遂不可問，國民誤其

崇拜英雄之途，而國遂更不可問。八君子之見擯於中國歷史，其毋乃卽中國民族見擯於今日生存競爭界之表徵也。吾述此，吾有餘痛焉耳。」（註十六）

三

由以上這幾項摘錄，便可更進一步瞭解，梁啓超所以喜愛傳記文學，所以特別喜愛這一類型的人物，乃有他個人的一項崇高動機與目標在。現在，我想把他的這種動機及目標作一扼要的分析：

第一，梁啓超始終認爲，一個國家的強弱興替，主要決定於這個國家的民族性及民族精神，尤其是冒險進取的精神。當一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都具有健全旺盛，冒險進取的精神，能勇往向前，精益求精，發揮自身的力量，以開拓前程，則這個國家也必能活力充沛，奮發向上，不斷克服環境困難，以優制劣，堅定立國於大地之上。假若一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缺乏這種精神，萎靡不振，則這個國家也將爲時代所淘汰。所以他撰寫名人傳記，是以培養及發揮這種民族精神爲第一要義。

第二，在談到這種精神時，他發現中國近來雖然非常缺乏這種精神，不能與西洋國家作比較，但在過去歷史上，中國民族也並不是沒有這種精神。於是他特別強調的提出了張騫，班超，

鄭和，趙武靈王，八大殖民英雄，以及被稱爲中國武士道的那些著名歷史人物來作說明。他這種意思，主要就是要經由發揚這些人物的勇毅精神，設法重新恢復及堅定中國民族的自信心。認爲祇要肯鼓勵精神，向此目標作努力，中國民族中這種進取開拓的歷史傳統，也可重見於今日。

第三，在梁啓超當時，他認爲中國在內憂外患煎迫之下，欲挽狂瀾於既倒，求國家的復興強盛，有幾位西方國家的復國運動領袖，應特別值得效法。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匈牙利的噶蘇士，二是意大利的復國運動三傑。他們雖各有其成敗，各有其不同的處境，但他們犧牲奮鬥，以求祖國獨立自由的偉大精神及感人行徑，均可作爲中國人的借鏡。梁氏本人，顯然以這些英雄人物作自許，他也希望其他中國領袖人物都能效法他們的模範。

第四，他希望經由這種傳記寫作，致力發揚中外歷史上的完美偉大的人格。在此方面，有兩位人物，在他心目中佔着一個特別重要的位置。其中之一，是法國革命領袖羅蘭夫人，其二，是明末督帥袁崇煥。在梁啓超看來，羅蘭夫人的所以偉大，並不在於她開風氣之先，以女流之輩登高一呼，作了革命的先鋒，而是在於她能在任何環境中，不顧一切危險，不顧一切後果，堅持她的原則，堅持其所認爲對的。假若羅蘭夫人不堅持其既定原則與理想，採取一種機會主義的作法，而與當時狂熱派的法國山獄黨人相妥協，則她個人的遭際及法國革命的整個過程，就會有不同的變化。至於明末的袁崇煥，他假若能與當時操權的朝臣虛與委蛇，苟且往還，不以自己在軍